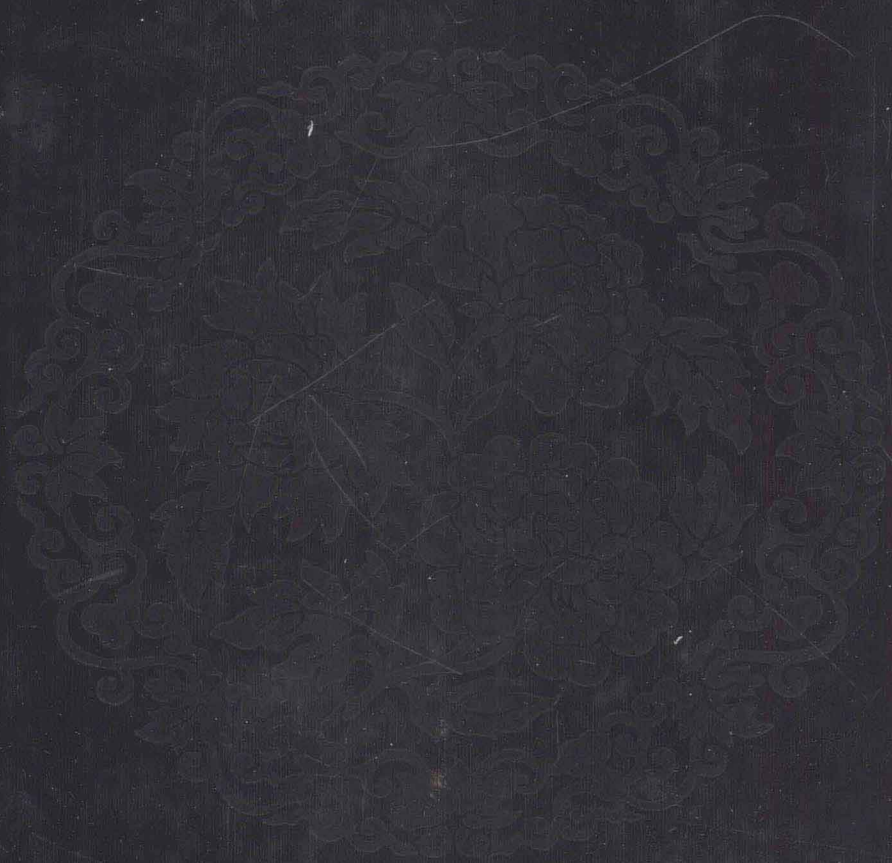


话说中国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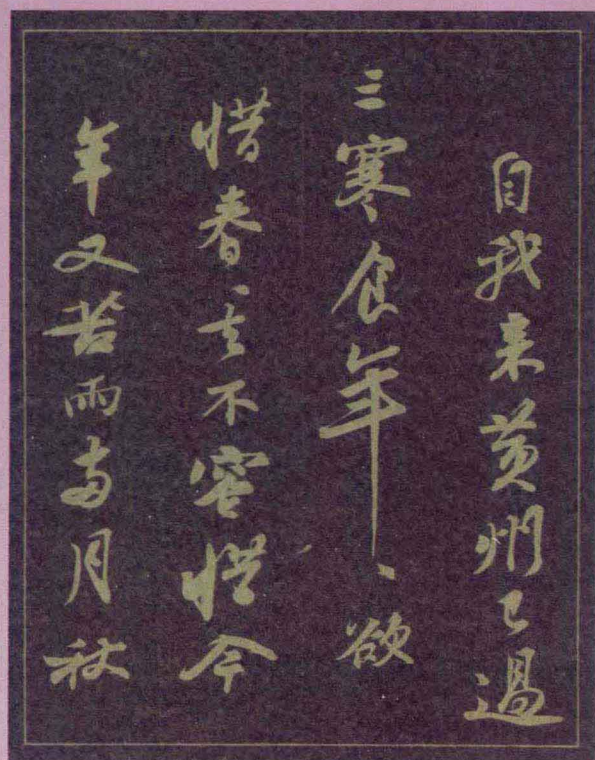
HUASHUO ZHONGGUO WENMINGSHI



话说中国文明史

第五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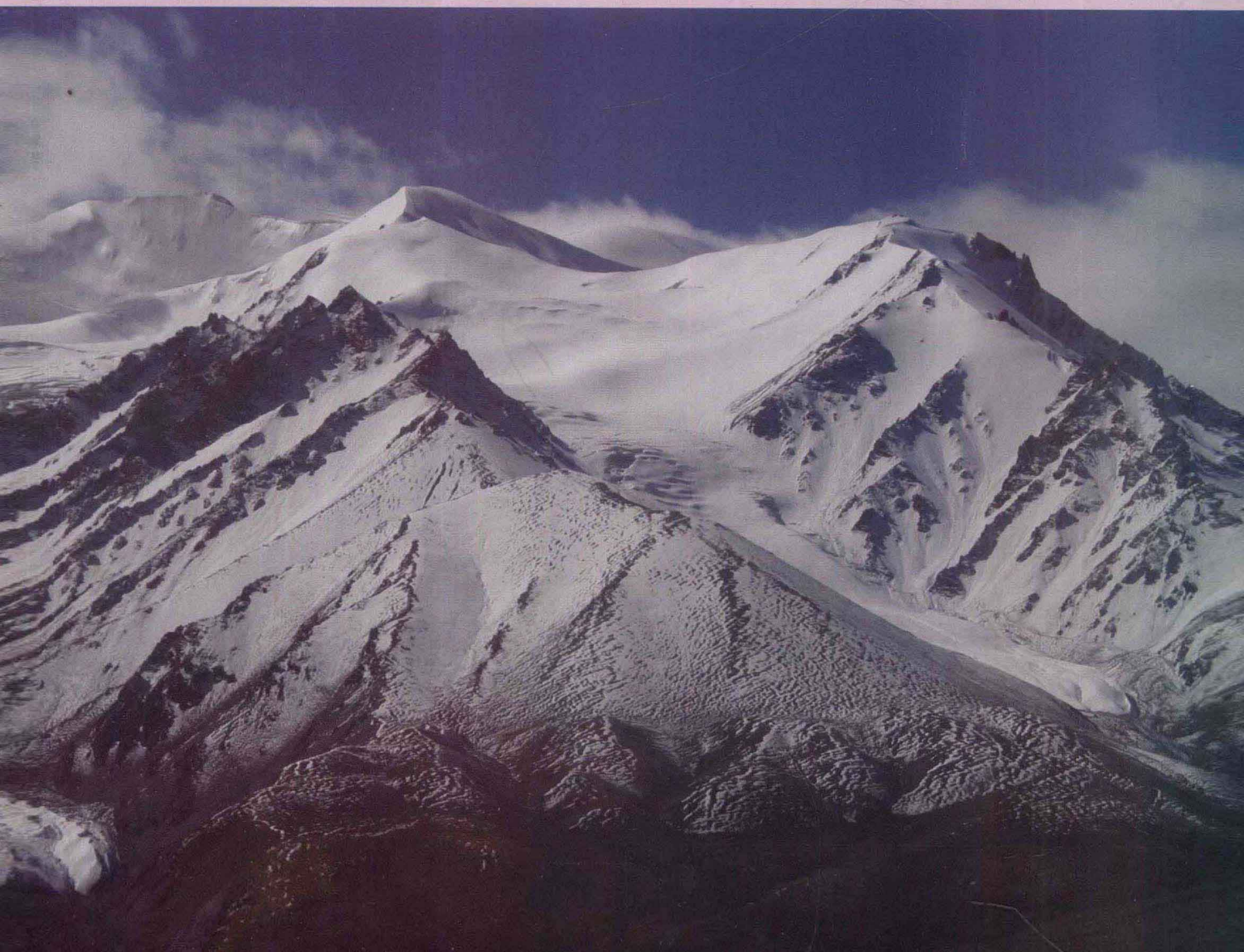


苏东坡寒食贴



古代帝王的蟠龙玉玺

神奇的昆仑山,相传周穆王驾八骏日行千里到此与西王母相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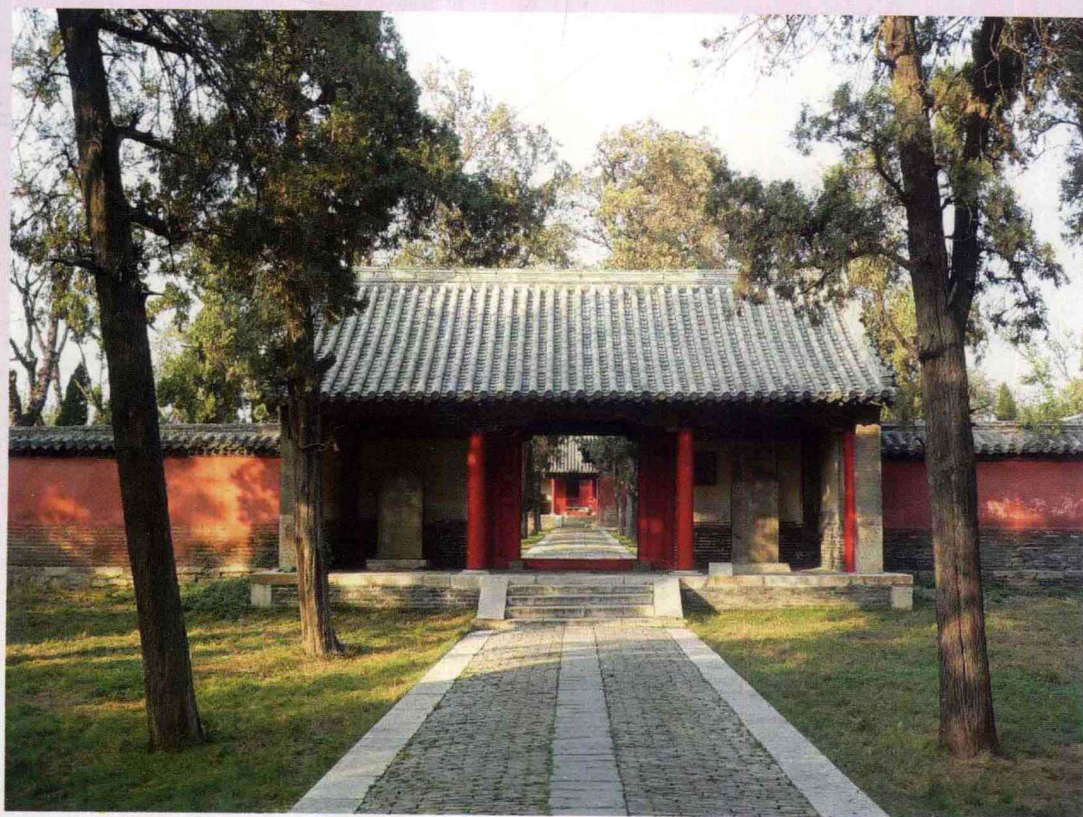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
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泰山孔子庙



西藏拉萨昆仑山口



中国礼乐文明
的奠基者周公庙



烟花三月扬州美景，
代天下第一繁华之地，迁
骚人，多会于此。



天下名楼岳阳楼

“蒙汗药”为何不见了

凡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书中使用“蒙汗药”的情节。在“吴用智取生辰纲”和“武松大闹十字坡”等回目中，都有用它麻翻人的描写。此外，在《醒世姻缘传》、《小五义》等明清历史小说中，也有使用“蒙汗药”的精彩记述。很多人对这种魔幻般的药物感到神奇、纳罕甚至有些恐惧，更多的人对此则是迷惑不解：“蒙汗药”是什么样子？它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含有哪些成分？这种药物后来到哪里去了？今天还能不能重现“蒙汗药”？

从历史小说描写“蒙汗药”的使用情形看，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使人失去知觉，即使刀砍斧劈也不会喊痛，很明显这是一种效力很强的麻醉药物。有关它的名称，宋代医学家葛弘毅在《溜水千方》中说，“蒙汗药”的“汗”本应作“汉”，意为专门用以蒙倒壮汉的。翻翻史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类药物的记载了。如《列子·汤问篇》说：名医扁鹊为公扈和齐婴治病，“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里所说的毒酒显见有极强的麻痹性能，竟然可以顺利实施心脏外科手术。但是，这种毒酒用何药配制，服用数量多少，书中没有说明。晋代学者张湛对此提出怀疑，认为这段记载“此言恢诞，乃书记少有。”根本不相信人世间有此药物。可是，他同时又承认东汉的名医华佗“能刳肠易胃，湔洗五脏，天下自有不可思议者。”华佗依靠什么手段来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湛也说不清楚。

其实，华佗能够进行这种“刳肠易胃，湔洗五脏”的大手术，全赖于他发明的“麻沸散”。《后汉书》对此有专门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内皆平复。”陈寿的《三国志·华佗传》对此也有类似记载。陈寿距华佗在世时只相差六七十年时间，《三国志》取材较为严谨，可惜的是有关“麻沸散”的主要药物成分是什么，怎样具体运用于临床，陈寿没有说明。

而与华佗同时代的医学家张仲景却有“麻沸汤”的配方，其主要成分为曼陀罗花、草乌、当归、川芎、南星等。华佗有个学生名叫吴普，是个药物学家，他写过一本《吴普本草》，记有一种名叫“麻蕒”的药草，有很强的麻痹作用。“麻蕒”与“麻沸”读音相近，有人以为这或许就是“麻沸散”的主要用药。可惜华佗的“麻沸散”配方和《吴普本草》俱已失传，那种“刳肠易胃，湔洗五脏”的外科手术用药也不见了，这使“麻沸散”之类的药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到了南宋时期，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窦材在他的《扁鹊心书》中，写有中药麻醉方剂，名曰“睡圣散”。此方记述说：“人难忍艾火灸痛，服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火麻（即大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这里所说的“睡圣散”，就很像华佗的“麻沸散”。方中说的山茄花即曼陀罗花，两种药方对照，其主要



药物成分是一样的。关于这一药物，比素材稍晚的桂林尉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广西曼陀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筐而趋。”由此看来，这种药物的麻醉作用已不仅仅限于医用，又被那些掠人财物的歹徒们派上了新的用场。

不仅如此，在黑暗的封建官场上，也有人发现了这种麻醉物的妙用。据南宋文学家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说，当时有些贪官污吏，因贪婪过甚，被人告发后害怕被处以极刑，便服用这类药物装死，有的竟以此逃脱了法律的惩处。看来在南宋时期，“蒙汗药”的使用已十分广泛了。再后来，明代人郎瑛曾引用《桂海虞衡志》说：“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由此不难想象，在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传》时，他们也一定熟知这类知识，并把它巧妙又很自然地写进书中，“蒙汗药”的威名随即传扬开来。人们惊叹它的玄妙，谈论它的神奇，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会也不可能去研究其药物成分，自然也就愈发增加了“蒙汗药”的神秘。

从史料记载看，“蒙汗药”的使用范围还要广泛，有人竟拿来用于战争，把这种药物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看，杜杞是大规模使用“蒙汗药”的第一人：“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从这段血淋淋的文字来看，杜杞竟用“蒙汗药”残酷地镇压了一次农民起义，一次就杀了好几千人，比起吴用、孙二娘等人来，杜杞不知要强过他们多少倍！

那么，使用“蒙汗药”者为何要将其放入酒中？这有一定的道理。一是因为饮酒时，气氛大都轻松和谐，容易使人消除戒心。更重要的是，从药理上来看，酒为水谷之气，能使药物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释放出来，使之引药上行，用以辅助药力，麻醉的程度加深，作用时间延长。二是“蒙汗药”放入酒中，是因为该药苦辛，二者融合不易品出它的味道，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知觉，酒劲过去，药力也消，待明白过来早已被人算计，无论怎样悔恨也晚矣！明人魏潜《岭南琐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他在岭南为官，外出办公用罢了官印，派小吏送回官衙。但他忘记了此人喜爱饮酒，结果这个小吏“途遇一人，引去他处饮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觉，印为盗去矣！数日捕得盗者，讯之对云：用风茄为末投酒中，饮之即睡去，须酒气尽乃寤。”看来，《水浒传》等历史小说中，常把“蒙汗药”入酒的写法并非随意编造，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那么，制造“蒙汗药”的曼陀罗花是什么模样？它为何要起个有进口味道的名字？这也是有来历的。

曼陀罗花，在古代叫做风茄儿、山茄子、野麻子等，今天的中药名为洋金花或风茄花。它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叶互生，呈卵圆形。夏秋开白色花，花冠为漏斗状，品之有苦臭味，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都不鲜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可知这一名称来自于印度，何时传入我国，不见明确记载。

当然，“蒙汗药”的原料不只是曼陀罗花一种，在人们的长期探索中，发现还有一些植

物也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从资料记载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草乌末。顾名思义即草乌的碎末。草乌是中药温里药中的常用药，有一定毒性，对人身体的神经末梢及神经中枢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活。”明初周王朱橚在其《普济方》中也录有用于麻醉的“草乌散”。朱橚是药物学家，一生考察过多种庶草，仅能充饥的就达四百多种，他所记录的这一药方，经过临床检验，其药效是无须怀疑的。

2. 押不庐。这也是周密说的一种“蒙汗药”。他在《癸辛杂识》中说，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当地人采集之后，研磨以少许入酒，饮之则通身麻醉而死，三天后拿解药服了可活。此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指出这是西土的一种药草，使人服后虽“加以刀斧亦不知”，可见其麻醉效果也是很理想的。

3. 坐拿草。北宋科学家沈括在《补笔谈》卷三“药议”中，有食用“坐拿草”“能懵人”的记载。明代朱橚在《普济方》中也说，进行骨科手术，使病人服用“坐拿草”、“曼陀罗花”各五钱，即锯凿切削，毫不知痛。可见“坐拿草”也是极好的麻醉药物。

4. 醉鱼草。又名“闹鱼花”，一种落叶乔木，夏季枝梢抽长穗状紫花，将其花、叶揉碎投入水中，可使鱼类很快麻醉。《本草纲目》载：“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围圉而死。”醉鱼草不仅用于毒鱼，而且可以拿来阉割猪、牛，将醉鱼草与曼陀罗花配在一起，各用三钱干末，拌食喂下，就可使之昏睡如死，任人阉割而无痛觉。同样，人若吃了醉鱼草的花、叶，也会出现头晕眼花，胸闷气慌，四肢麻木等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死亡。

除以上这几种“蒙汗药”物以外，有的资料还说茉莉花根泡酒，饮后也能使人麻醉，并且可以“经几日不死”。古代有些官吏曾用这种药酒使人假死，用以捉弄或威胁案中有关人员。但这种麻醉药酒只有零星记载，有的还是出于文艺作品，不见医家认可，是否真有麻醉药效，还不好论定。

其他还有一些中草药对人有程度不同的麻醉作用，但因其数量稀少，地域有限，难以采摘，又不好掌握其使用分量，加之泡制过程也很复杂，故不易为多数人所了解。而曼陀罗花易识易采，加工简单，药效又很明显，故而受到许多人尤其是绿林好汉们的青睐，拿它作为“蒙汗药”的主要药物，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世间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既然有能麻醉人的“蒙汗药”，也就能找出化消其药力的解药。如《水浒传》第二十八回这样写道：“孙二娘便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这种灵验的解药以何物制成，《水浒传》上同样没有说明。北宋沈括在《补笔谈》中提到某人误用“蒙汗药”后，食用坐拿草心可催人醒，这种东西可作解药的原料，古人早已知晓。

此外，明代文学家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转引宋人洪迈说过一种名曰蓝汁的解药。当时有个和尚生病噎死，其状甚惨。这位僧人的死亡引起一名老郎中的好奇，他下决心查清和尚的死因。于是“剖其胃，得虫，诸药试之皆不死，时方治蓝，以蓝汁浇之，即化为水。然蓝不独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杀诸虫。”谢氏认为蓝汁解百毒，当然也能解“蒙汗药”。但是，能否真有这种作用，他不敢肯定，仅仅是种推测而已。不过，谢氏的这一推测

在明末学者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精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这里的天茄花即曼陀罗花，看来蓝汁确实可作“蒙汗药”的解药。

但是，蓝汁稀少难寻，一般人也不知制作方法，常见的甘草是种很好的解药。甘草又名“甜草”，为多年生草本豆科植物，产于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的广大地区。它的根和根状茎，均含甘草甜素等。其性平、味甘，能“治七十二种乳石毒，一千二百般草木毒”，对化解“蒙汗药”同样有明显效力。

又据宋代《日华本草》载，“以绿豆汁、甘草、升麻、犀牛角”煎汤，也可解“蒙汗药”。此外，在民间验方中，白茅根共蔗汁加水煎服，鱼腥草和防风水煮后加红糖服下，或饮生姜和蕤菜根的汁液，也是效果明显的解药。

或许有人要问：“蒙汗药”及其解药既然这么灵验，为何在近代竟失传了呢？

说到这点，不能不提到西方国家使用的一些麻醉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笑气、乙醚、氯仿等化学麻醉药品先后问世，并很快成功地运用于外科手术。十九世纪末西医传入我国，其先进的化学麻醉药品取代了传统的麻醉药物，“蒙汗药”的渐渐消失，也就不可避免了。

但是，我国的科研人员尤其是一些医学科学工作者并没有放弃中药麻醉剂的研究。经化验分析，古代作“蒙汗药”的曼陀罗花含有莨菪碱、东莨菪碱和少量阿托品，有较强的麻醉作用。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在1970年7月8日，研制成功了以洋金花为主药的中药麻醉汤，先后在十多万例外科手术中应用，效果令人满意。同时还发现，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中药麻醉剂，可以致人昏迷，用毒扁豆碱静脉注射，只需十多分钟即可完全清醒，显然这又是另一种效果理想的新解药了。

综上所述，古代小说中描绘的那些“蒙汗药”并不神秘，它的成分既不复杂，炮制起来也很简单。

《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在哪里

《清明上河图》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一幅宋代名画，高不满一尺，长两丈有余，作者以全景式的构图，全面、细致、真实地描绘了北宋时期的都市生活，其场面之大，器物之多，人数之繁，为古代绘画作品所罕见。

这幅画的作者，系北宋末年翰林画院待诏张择端。关于他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据郑振铎先生考释，他大约生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省）人氏。从小在家学画，稍长游学东京（今开封），悉心访求名师，技艺突飞猛进，渐渐有了些名气，后来被宋徽宗看中，召为翰林画院待诏。这人脾气很怪，不绘易于讨好的花鸟、山水，却专攻费时费力的界画，练就了一手勾描线条的绝活。《清明上河图》大约完成于宋徽宗宣和（1120—1125年）年间，这时张择端正是四十岁左右的壮年，艺术也进入了成熟时期，他深入观察了汴京一带的市肆、街道、屋宇、桥梁、盘车以及各行各业的人物，精心创作了这幅巨画。该图布局疏密有致，用笔精细传神，设色清爽典雅，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北宋

末年汴京的建筑、交通、服饰、市景和民俗等，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风俗画卷。

《清明上河图》大致分为四段：第一段从荒郊野外算起，到汴河上的五个纤夫为止，引导人们进入汴河和热闹繁华的京师之地；第二段表现那座巨大的虹桥，显示了它的丰富的生活内容，是本图着力描绘的一个高潮；第三段是城厢外面的十字街口，重在反映汴京盛时之伟观的和平景象；第四段是城阙后的街道容貌，把汴京的繁华推向极致。

这幅画粗略看来，主要描绘了三种自然景物，即虹桥、汴河、大桅船。若要用心去看，作者的笔墨主要在于描绘人物，士农工商、卜医僧道、胥吏健卒，篙师缆夫，妇女儿童等等，几乎包罗了三百六十行业，人物数不胜数。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多少人呢？据斋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画上共有人物 1643 个，还有 208 只动物。别看图中人物身高尚不盈寸，而动作表情却曲尽意态，描绘之精，展现之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清明上河图》出现以后，一时摹者四起，但没有一幅能够达到原作的水平。稍后一个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历史画和风俗画，如李唐的《伯夷叔齐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及萧照的《中兴瑞应图》等，虽然这些绘画同《清明上河图》一样，也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盼望清明、向往盛世的主题，但其艺术成就和地位就逊色多了。

北宋灭亡以后，赵构一伙南逃，《清明上河图》也加入了逃难的行列。护持者将其视如生命，日夜小心看护，幸未落入金兵之手。其后辗转流传，不知几易人手，上至当朝皇帝，下至布衣百姓，都在搜寻此图。据传明代权臣严世蕃，为了攫取这幅名画，竟害死了收藏者王忬。王忬官至蓟辽总督，为朝廷一方大员，其身价竟不如一幅名画。当然，王忬冤狱另有原因，但以《清明上河图》附会此事，也足见这幅画的珍贵价值。传统剧目《一捧雪》，表现的就是这场悲剧，戏扬画名，天下皆知，《清明上河图》显得更珍贵了。

似此价值连城的名画，许多人都关心它的下落。其真迹到底在哪里呢？

除去容易辨别的描摹赝品之外，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某博物馆，都声称藏有《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然而真迹只有一幅，究竟哪是张择端的原作呢？

先看北京的藏品。它的尺寸、质地、画风等，完全符合有关史料的记载，图上有从宋至今诸多收藏者的题跋、印鉴，多而不杂，流传有序，而且经过一代又一代高手的鉴定。郑振铎和徐邦达先生认为，此本当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再看台北的这幅。名为《清明易简图》，从画的外观看来没有丝毫问题，作者的用笔、设色及一些印鉴也不像有假，而且上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的字样，经与张氏的其它画作对照，笔迹确属一人。因而台湾的刘渊临先生认为，“此图具有绝对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是张择端的“地道的真本”。

最后美国的珍藏。这幅《清明上河图》称为“元秘府本”，以瘦金书题跋，上有“宣和二年（1120 年）七月”晋献皇帝的记载，瘦金书是宋徽宗的发明，系当时风行的书体，从题跋的内容和献画时间看，此图当是张择端的真迹。

仅从这些来看，三者皆有所本，而且理由也很充足，然而不可能三幅都是真迹，必有两家是赝品（也可能全部是假货）。到底哪件藏本是原作呢？想要揭开这个谜底，只要弄清另两幅的底细，或者叫作别本的来源，就能判定清楚了。

前面已经说过,《清明上河图》完成以后,很快出现了一些摹本(这些摹本至今也很珍贵),有的水平很高,得之视其为宝,秘藏不易外露,整个南宋一朝,无人辨其真伪。到了元代,发现了两幅《清明上河图》,一为“秘府本”,一为“似本”。顾名思义,“秘府本”应为真迹,而“似本”只是好像、相似的摹本。正如元代书画鉴赏家杨准在《清明上河图》题跋中所说:“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这就明确说明,“似本”乃冒牌产品,生产年代应是元朝。

然而“秘府本”的身份并没有保留多长时间,到了明代,收藏家张英公又发现了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可称“稿本”。上有自宋以来的鉴定图章和题字,代代相传,很有次序,张英公认定此为《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并且写了一段题跋,语气不容置疑。这样一来,“元秘府本”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秘府本”与之相比,到底哪一幅是张择端的亲笔呢?

现在首先看看“秘府本”的情况。

清初著名文学家钱谦益对此作过考释。在其《牧斋初学记》卷八中有载:“秘府本”传至明代嘉靖年间,曾被大奸臣严嵩夺占,严氏父子倒台,家产籍没充官,字画珍玩全部上交朝廷。在清点造册过程中,“秘府本”被一宫廷内臣发现,想要据为己有,遂藏于御沟石缝之内。不料天降大雨,御沟水漫石缝,更要命的是,大雨下了两天两夜,待到雨过天晴,石缝中的“秘府本”已经泡成纸浆,从此该本弃毁。这样看来,美国博物馆所藏《清明上河图》的“秘府本”,就一定是假的了。至于他们的这一“秘府本”是怎么来的,那可另当别论。

其次就是《清明易简图》了。

关于此本,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诗人沈德潜有过说明。他在《清明易简图疏解》中说:“张择端清明画图,本有二幅,一在张英公家者,名《上河图》,有张著跋;一留汴京者无跋,意即《易简图》也。”这就是说《清明易简图》并非张英公所藏之“稿本”,而是另一幅珍贵的《清明上河图》。上面已经说过,“秘府本”已经失传,那么台北所藏的《清明易简图》当是“似本”无疑了。

这种说法,从《清明易简图》的题跋看得更加明显。该图画完之后,元代书画家苏舜举首先题跋,他提笔就写“清明易简新图成”,时间是在元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这说明《易简图》明显出于元人手笔,决非张择端的原作。不仅如此,这位元代画家还在原图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大胆添加进去元代事物。比如,《易简图》中有“以板为舆无轮厢而陆曳者”的场面,有对“驱牛种田者”的描绘,最明显的是元代独有的“奎章阁”等等。张择端是北宋画家,他决不会描绘元代社会的景物,而且这些景物只是《易简图》才有,专家们推断,台北的这一珍藏,当是被毁掉的“秘府本”的“似本”。由于描摹者的重新创作,已经增加了新的内容,改动了一些场景,严格说来它甚至连《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也不是了。

现在剩下的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稿本”了。专家们经过考释后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画,为张择端亲自勾描的“稿本”,这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画面上有后人留下的证明,如题跋、钤印、收藏日期等等,还在于能从其它方面得

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揆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揆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揆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揆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祐十九年（922年），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年）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年）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年），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继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瑭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

到印证。如,《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不是“清明节”之意。又金人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点明此图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也认为张择端所作是“南宋时追慕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引见《容台文集》)。从图中驮木炭的驴队、光着上身嬉戏的儿童、及摊上的西瓜等,也足以说明这并不是“清明节”时的场景。因此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别本跋》一文中说: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亦不似”,也就是说此图不是描绘清明寒食时节民俗禁烟的情形,而是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光景,这与北京的“稿本”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定此图是张择端早期的亲笔。换言之,《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人收藏的所谓“秘府本”,虽然能迷惑一部分人,却是赝品无疑。还有人认为,尽管它没有北京“稿本”诸多题跋和铃印,但这符合“秘府本”应有的特点,原因在于流传有限,见者极少,所以才少了收藏记录。然而,真正的“秘府本”早在明嘉靖年间就已不存,美国的藏本虽然从表面看无可挑剔,但不是张择端的原作,只能是《清明上河图》的晚期摹本了。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是真迹,不过也只是“稿本”而已。那么,张择端的定稿本在哪里呢?大概还得继续寻找下去。

能否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年)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



石敬瑭像

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撤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维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谏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剥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首先，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次，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再次，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

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 10 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第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唯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 30 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旧五代史·晋书》）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第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 15 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最后，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敬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靦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昭言虜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

